

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编

壮族文人著作

菜根草堂吟稿

(清)黎申产

刘映华注释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菜根草堂吟稿

(清) 黎申产

刘映华 校注

(桂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 马丕环

特邀编辑 梁杏云

封面设计 玉荣奖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邮政编码: 530021

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开本850毫米×1168毫米1/32

印张 18、32

字数 455千字

版次 1993年3月 第1版

印次 1993年3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册

书号 ISBN 7—219—02343—X/K·215

定价 10 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，也是我国典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其源远流长，绮丽多姿。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则是这个宝库中的一朵奇葩。

广西聚居有壮、瑶、苗、侗、仫佬、毛南、回、京、彝、水、仡佬等十一个少数民族。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四百多万。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。千百年来，广西各族人民在开拓祖国南疆的历史过程中，或用自造的文字，或借助于汉文，或靠口碑世代流传，给后人留下了浩繁的民族古籍，丰富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，为祖国历史学、民族学、哲学、伦理学、民族文学、民族艺术、民族医学、民族宗教等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，国务院国办发（1984）30号文件指出：“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，抢救、整理少数民族古籍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。”遵照这一指示精神，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，加深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，增进民族团结，丰富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，促进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我们在对区内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、抢救、整理的基础上，有计划地出版这套《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。

本丛书严格按照古籍的原意原貌进行编译整理，或标音意

译，或校勘注释，力求民族古籍整理的准确性、科学性，以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研究。由于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办 公 室
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

序

遵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搜集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指示精神，广西于1985年正式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，开始组织人力对广西少数民族古籍（包括民间口头文学）进行普查、搜集工作。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，它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。广西起步虽然晚了一点，但是经过三年多的努力，已经初见成效。根据分工，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了少数民族文人著作的搜集、整理任务。他们用了年时间普查广西几家大图书馆收藏的700余种古籍，从中鉴别出历代广西少数民族文人著作约60种，查出收录少数民族文人作品或关涉少数民族内容的古籍100余种，另有作者族属待考的古籍约30种。在普查暂告一段落后，他们着手整理广西少数民族文人作品，列入先期整理计划的有壮族文人诗集10种左右。已发现的少数民族文人著作基本上是壮族文人著作，其中又主要是诗歌，所以整理的重点自然放在壮族文人的诗歌方面。

所谓壮族文人著作，指的是广西壮族文人用汉字写成的著作。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绝大部分生活在广西。壮族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道，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。壮族的口头文学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（在民间还有以“古壮字”记录的歌本，那也属于民间文学范畴），是壮族文学的主流，为世人所瞩目；至于壮族文人文学的情况怎样，则鲜为人知。我们知道，壮族过去没有自己的统一规范文字，古代壮人仿汉字创造了古壮字，用以记音表义，但仅限于民间范围，官方是

不用的。由于壮汉杂居，文化交流（这种杂居和交流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），大抵自唐宋以来，壮族社会开始出现了某些上层人士和他们的子弟在汉文化影响下，读汉书，识汉字，用汉文写作，逐渐形成了沟通汉壮文化的知识阶层。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，产生于唐高宗、武则天时代的《大宅颂碑》和《智城碑》，就是壮族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。唐代科考盛行，壮族有无文人参加尚无可知，但影响肯定会有，北宋出现几位壮族进士决非偶然，正说明读书求仕进之风在广西壮族地区渐染已久。到了明清两代，特别是清代，随着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，教育日兴，书院渐增，参加科举考试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多起来了。据初步统计，明清两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进士的有130人，中举的有近两千人，其中有一部分人做了地方官吏，还有少数人平步青云，成为朝廷的重臣。当然，大量的还是科场失意、仕途偃蹇的知识分子。但无论是处官位还是居山野，他们既习熟汉文，总免不了要用汉文作为交际工具，或做诗填词，或写文章，以此表达他们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大自然的看法，抒发自己的感慨，寄托自己的情思。其中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之士，他们的传世之作可自成一家，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壮族文人阶层的形成不是一种孤立现象，它至少可说明两点：（一）壮族不是保守的民族。从古至今，壮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，但它不是保守的民族，它不仅早已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，也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，可见壮族是个勇于进取的民族，而不是固步自封的民族。壮族人民消化吸收了汉族文化之后，自然增进了壮汉民族在一定程度的融和（也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同化），促进了壮汉民族的团结共处。（二）壮族文化阶层，考其渊源，最初多半出自土官、土官子弟或土官后裔，后来逐渐扩展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。他们一旦跻身士林，便可享受朝廷封爵，或具备了擢升为权贵的条件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壮族文

人阶层的出现，促进了汉族统治阶级和壮族统治阶级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联合。这无疑有利于加强历代中央王朝与壮族地区的联系。

我们今天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历代壮族文人诗歌，不是为了猎奇争胜，更不是为了獭祭古董，而是别有一番深意。

首先是广西壮族文人诗歌具有值得继承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。综观壮族文人诗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它们一方面基本上继承了汉诗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同时又以独特的视角，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乃至风土人情与民族心态，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调，出现了各种流派，异彩纷呈。其中有一部分近代诗篇充满爱国主义激情，有较强艺术震撼力。将它置于近代爱国主义诗人的诗篇中，很难分出伯仲高低。它们确实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曾发生于中越边境的中法战争，有好几位壮族文人的诗歌写得十分深刻，有些诗篇的作者曾亲自参加过反抗侵略者的斗争，他们的诗作不同凡响。总之，壮族文人诗歌从整体看，尽管数量有限（已发现的大概不到两万首），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却是无可争议的。

其次，从民族史学的角度看，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壮人读汉书，识汉字，用汉字写作，参加科举考试，受朝廷封爵，这一发展过程的史实，是研究壮汉民族关系史和壮族政治、经济史、文化教育史的宝贵资料；至于诗歌本身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，更是民族史学家们研究民族历史的宝贵史料。

再次，整理出版壮族文人古籍，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。壮族文人诗歌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它长期被埋没，不为人知，许多名家之作，或早毁于兵燹水火，或任虫腐蚀，湮没于世。这就难怪为什么洋洋数百万言的中国古代文学史，近代文学史中对它只字不提，在众多

中国古代作品选中也没有它的一席之地。现在是到了抢救它，让它重见天日的时候了。

最后还应说明一点，诗集的作者，他们在学习汉文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他们大多数又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，思想的局限，阶级的局限自然使他们的作品精芜混杂，良莠并存，既有民主性精华，又有封建性糟粕。他们既不满意于社会的黑暗腐朽，但对正统封建王朝却又一往情深；他们既同情人民疾苦，却又反对农民起义。这正是壮族文人阶层的思想重要特征。望读者阅读时明辨是非，取舍有度。

张声震

1989年3月

前 言

黎申产，广西宁明人，字蠡庵，号嵩山，又号十万山人。壮族。1854年，黎氏在《答蒋地川翊瀛见示，仍用前韵》诗中自注：“予与地川同甲申年生。”知其生于道光四年，即1824年。卒年无考。《宁明耆旧诗辑》卷六有黎氏小传：“清道光丙午（1846年）科举人，任庆远府儒学训导。先生博览群书，诗才赡逸。致仕后任宁江书院山长二十年，以诗文诱掖后进，一时文风大盛。”黎氏诗集中有《庆远府冷斋述怀》诗，作于壬申，时为同治十一年，即1872年，是其开始任庆远府儒学训导之年。又有《乙亥新正二月携芸恹儿谒黄山谷先生祠，祠后有墓》诗，同年有《朱子良太守尔辅见示重九感怀诗，依韵奉和》，知1875年深秋黎氏仍在任上。致仕，至早当在1876年。他在庆远任上，每有官场应酬之作，而1876年以后绝响，当已致仕。其诗集终篇为《哭亡儿芸恹》诗，自注云：“儿亡于丁丑上元日，遗一子已六阅月。至己卯闰三月，而其室张氏亡，阅数日，其子亦继亡。”丁丑，即1877年，己卯为1879年。从丁丑年作者归家为子治丧起，可能是其开始任宁江书院山长之时。从1877年下推20年，黎氏当卒于1896年以后，享年在71岁以上。

黎氏有《癸亥四十初度感怀十首》，其二自注：“戊戌年府试，为太守景公慎斋所知，是岁入学，以经古受知丁伊辅夫子。”戊戌，即1838年，黎氏年仅十四岁。上诗其三自注：“谓钮松泉夫子壬寅年（1842）携至桂林。”1842年作者在桂林游学，

1844年返里，留桂林约计三年。上诗其四述其中举在1846年，岁在丙午：

传眼韶华二十三（自注：“岁在丙午。”），秋来逐队又携篮。雍容人海年犹少，驰骋文场战正酣。虎榜幸能容位置，蟾宫原不阻登探。荣归博得双亲喜，笑把灯花仔细谈。

是年冬，计偕入京，明年，铨羽而归。其后因居母丧，1848年末上京再考。上诗其六：

万事凄凉始戊申（1848年），杯圈口泽痛慈亲。弟兄偶影依苦茨，今古伤心属棘人。驹隙三年刚释服，狼烟一旦又沾巾。平生长物吾何有？自叹仍然转徙频。

1850年太平军在金田起事，桂平离金田近在咫尺。黎氏于1851年到1852年居家办团练，守土有功，地方大吏奏请，准加六品衔头：光禄寺署正。关于此事《宁明耆旧诗辑》卷六黎氏小传记载有误：“桂抚马玉山丕瑶阅边，索观所著《宁明州志》及菜根草堂吟稿”，题其卷首，有‘边徼乃有此奇才，道其南乎’之语，为题请褒奖，加光禄寺署正衔。”其误有二：（一）马丕瑶任广西巡抚，时在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至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以忧免。离黎氏去世之期不远。黎氏得光禄寺署正虚衔当在咸丰元年。奏请六品头衔的大吏当是周天爵而非马丕瑶。（二）因文字著述而向朝廷请封之事，在清代不多见。黎氏得六品衔，实因办团练之故。我们还是看看黎氏的“夫子自道”吧，前诗其七就有交待：

大吏忘羊急补牢，法行团练仗吾曹。（自注：“辛亥年事。”）为严号令难辞谤，欲卫乡邦敢惮劳？两载经营增雉堞，（自注：“修城垣。”）一番劳来集鸿嗷。（自注：“发抚卹。”）谈兵纸上寻常事，中下头衔愧宠褒。（自注：蒙奏准加六品衔。）

1853年黎氏有《癸丑仲冬偕越南贡使西旋途中感作，用老杜

《秋兴》八首韵题壁》诗之五，已有“卅载头颅衔六品，可怜无分列朝班”句，次年又有《杂书》六首，记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事，之四有云：“我亦膺荐剡，六品阶级骤。”足见得六品头衔不会在1853年之后。《清实录》咸丰元年二月十三日〔癸午〕（1851、3、15）：“以广西绅团剿贼出力，赏团长生员黎建勋五品顶戴，蓝翎，余升用给顶有差。”（转引自《广西人民出版社《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》卷4，第11页）黎建勋是宁明绅团的团长，因抗卸太平军有功，得五品顶戴，蓝翎；而黎申产亦因立功，得六品顶戴。事载史册，不为无据。

《宁明耆旧诗辑》成书于1932年，校辑者7人，时间去黎氏之歿才30年左右，乖谬如此，殊觉可怪。按《诗辑》所选黎氏之诗，仅收《妆台百咏》，而不录《菜根草堂吟稿》之诗，大约辑校者徒知有《菜根草堂吟稿》，但吟稿未刻板行世，搜求不易，竟未翻阅，亦不可知。

六品虚衔，不过画饼。黎氏仍不得不奔走于科名之场。1852年黎氏入都参加大挑，有《计偕入都，赴明年癸丑（1853年）会试，起程日作》诗，这时，道路不靖，也只好付之度外了。诗中云：“寒士出门难自立，强徒满地欲何之？涉波闻道凭忠信，鹤唳风声且莫疑。”此次大挑仍落榜而归。归途中由于干戈满地，几经周折，辗转到了梧州，又被红巾军围于城中，三年之中尚未到家。比且到家，其父亦已辞世。《癸亥四十初度，感怀十首》之八：

未了名心再入都，（自注：“壬子十二月。”）时
艰偏不畏驰驱。关情难得诸知己，点额依然一故吾。总
为四方多暴客，遂令三载滞征途。到家已抱终天恨，我
罪伊何泪欲枯。

1871年黎氏又一次入都应考，再一次落第。黎氏家境清贫，入都应考不易，曾有川资枯竭之苦。平时全靠课读以谋稻粱，除在庆

运任教职外，先后在宁明、桂平、龙州、钦州等地设讲席，致仕后任宁江书院山长20年，可以说把一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。

黎氏著作，今存《菜根草堂吟稿》上下两卷，《宁明耆旧诗辑》录其《妆台百咏》一卷。外有《宁明州志》二卷（有两个内容不尽相同的版本）。还有《宿缘小名录》、《医案》二《菜根草堂读书记》四卷皆已佚。《菜根草堂吟稿》尚未付梓，至今只手稿存世。

× × ×

《菜根草堂吟稿》上卷之前，有作者《自述》，作于癸未（1883年）。文曰：

人而仅以诗传，浅矣！况未必可传乎？益可悲矣！顾知其未必可传，而仍日吟焉，删焉，钞焉，何也？曰：此性之所好，无所为而为，不能自己也。彼世之人，或好饮，或好弦索，或好田猎，或好博奕，自吾视之，不知其何以好之若此也，则彼之视吾，亦若是矣。此余二十年前编辑诗稿，自为解嘲语也。然自丁丑（1877年）以后，爱子永诀，未能为太上之忘情，遂废此事。今年六十矣，翻阅旧作，不忍一生心血竟付沈沦，爰将旧稿再加沙汰，得此二卷，将付手民，以俟后之知我者。“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，不自知之过也。”或斥为“诗痴符”，或笑为“覆瓿”，所不恤已。光绪九年，岁在癸未，仲夏月，长至日。宁明黎申产识。

《妆台百咏》从女娲起，到毛惜惜止，所咏有我国古代之贤妃哲后、才女贞娥、美人丑妇、祸水淫娃，共计54人。从序言中知作于30岁时，当是从吟稿中剔出来的。这里整理的仅为《菜根草堂吟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吟稿》）上下卷。

《吟稿》题材广泛，体裁多样，不拘一格地反映现实生活，抒发个人感受，形成风格各异的作品。

《吟稿》的作品，约略可分为三个创作时期。

自1842年至1849年为早期阶段。这个时期，作者风华正茂，生活安定，壮志在胸，主要奋斗目标还是科名仕进。1846年，他参加桂林乡试，有《丙午，八月十五夜遇棘闹号舍壁，用蒋心余先生韵》七绝二首，其二有句：“广寒折桂寻常事，只要朱衣暗点头。”可见其视取科名如拾地芥的心态。中举之后，上京应试，第二年败落而归，却心平气静，沿途陶醉于佳山秀水之中，悠闲自得。五律有《芦沟晚晓》、《晚泊嘉鱼》、《洞庭晚泛》等作，对景寻诗，意境清新。

此外，七律有《朱仙镇道上书所见》一首：

客途此日正奔波，鸿雁嗷嗷满目过。
千里桑麻空赤地，万家烟火尽黄河。
看花漫惜青骢少，乞食谁怜翠袖多？
闻道长官筹振粟，枯鱼难得痛如何？

此诗作于1847年。题注曰：“前时西决，朱仙镇推关帝，岳王二庙无恙。”诗中反映朱仙镇因黄河决口之后，赤地千里，灾民待赈，望眼欲穿而赈终不至的惨景，读之令人心凉。

五古有《丙午春初将之桂林，示内一首》，离家之际，告别妻子，漫话家常琐事，兼吐怀抱。情感纯真，语言朴实动人。七古有《登楼忽遇大风，纵笔作歌》一首，奇崛振荡，气格豪迈。作者所写的五言诗平易自然，风景诗则清新可读。这个时期写过一些吟物、吟古以及题画诗，大多典重清新，讲求寄托。此外，还有一组六言诗《自衡阳上水至唐家司一路舟行，杂纪六言》共七首，《游仙诗》共十三首。前者以描绘风物景色为主，后者寄托当时境况与情怀，皆为集中所仅见者。

这个时期，作者的诗作初具规模，并作了广泛的尝试，诗风处于形成阶段。

从1850年至1856年是作者创作的第二个阶段。此时，太平军

起义的烈火，燃遍大半个中国，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作者于1852年底首途，赴京应试，再次落榜，归途中因烽烟遍地而流落，三年未归。在这个时期作者所作的诗歌，每有家国之悲与个人身世之感。风格上沈郁顿挫，中多苦调。

1852年，作者有《自家至桂林一路杂诗》七绝十首，反映在干戈满地中赴考，劫灰处处，吊古怀人，思念家乡，情调萧索凄苦。《腰站戏书》七绝二首，描写在小小腰站客店中竟有“填门脂粉似云来”的众多歌妓，而奔走于科名道上的士子，只能“一个佳人掷一钱”。可见妓女和乞丐差不多，仕子处境穷困，同有沦落之感。

在旅途中，作者还作有五律《三十初度书怀》五首，感时伤世，听雨怀人，羁旅愁思，百感交作。“中酒时看剑，谈兵孰清纓？”虽作壮语，而“远道高堂梦，秋风旅舍情。者番憔悴别，误我是科名。”苦涩之味，已在笔端。至于“阿忆忧存否？家书久不通。遥知流贼满，定置乱山中。见汝期难定，伤予命太穷。兰摧休学姊，摇落委秋风。”摧肝裂腑之言，使人不可卒读。归途中另有《行路难三首》，集中反映时局艰危，个人飘泊，道路艰苦，忧思如焚，狂歌当哭，一泻无余，震人心魄。

黎氏震于太平军雷霆万钧的威力，深感最高统治者有朝不保夕之虞，站在维护封建秩序的立场上，从某些侧面在诗作中反映了这场斗争。1850年有七律《庚戌感作，用老杜〈诸将〉五首诗韵》五首，观点上有鲜明的局限性。诗中吐露忠孝悲愤之怀，联系上下古今之变，写其身历险阻穷困，笔墨纵横，波澜变化，抑扬顿挫，无不学杜。此后又有《癸丑仲冬，偕越南贡使西旋，途中感作，用老杜〈秋兴〉八首诗韵题壁》七律八首，和上五首一样，悲时伤世，身世之感，羁旅之愁，思亲怀旧，凄怆激愤，沈郁顿挫。《汤阴谒岳忠武庙，遍读壁上诸题咏，似于朱仙镇、西湖两处亦可移用，因每处各赋一首》、《读史杂感》五首等作

抚今思昔，寄托感兴之处，和上述各诗殊无二致。至于咏物诗《春草》七律六首，化用前人诗句，典雅清新，讲求寄托，亦尽其妙。

此时七古和歌行体较多。其中《二弦行，送游任之茂材尔涉，用白傅琵琶行原韵并序》，追逐白居易，悲时事之沧桑，伤人生之聚散，低徊宛转，一唱三叹，沈郁凄怆。《题许月樵懿林风雨怀人图》伤离叹别，苦乐对比，音韵铿锵。《癸丑隆冬，冲风冒雾，登襄阳岷山，欲赋诗纪事，未暇也。今春舟中无事，诗以补之》，铺写中奇峰突起，新奇峭丽。《悲书画，为许君月樵作》、《清明后一日与农雨苍重谒刘太仆墓，补读陈寿山先生所撰神道碑，次农雨苍诗韵》二诗，抚世怀人，尽波澜变化之妙。这些诗或酣畅，或遒劲，或激扬奋厉，或情意深厚，得杜甫，昌黎笔意，都是作者的着力之作。

1854年，黎氏被困于苍梧城中，写下《苍梧谣》十一首，以古代歌谣体写当前社会中的重大事件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1855年又有《瓦窖破，为吴澹园观察德征赋》共六解，写一次战斗，从定计到结局，有人物活动，有气氛渲染，以至歌功颂德止，只用了130多字，又呈现了古朴高简的风格。

1857年到1875年是黎氏创作的第三个阶段。这个时期太平军的起义斗争逐渐走向失败。广西天地会的斗争虽仍在进行，但影响全局的暴风骤雨渐渐过去。黎氏以课读谋生，生活相对安定；又曾上京赴考，旅途顺适，得一儒学训导之职，步入官场。这个阶段的作品，如《癸亥，四十初度，感怀十首》，回首往事，仍是沈郁顿挫的风格。《古镜》、《古琴》、《老将》、《老儒》等自喻之作，仍见典重。此时仍有苦涩以至瘦硬的作品，但也逐步向清新闲适转化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（一）描写自然风光的诗作增加，（二）题画的作品也占较多的比重，而这些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闲逸雅兴。

1857年，黎氏有七绝《村居遣兴绝句四首》，描绘了田园生活。1859年有五律《消夏八首》，写夏日景物，都表现了闲适的情怀。1869年，有五律《六月十六日，自钦州暂回寒舍，一路纪行杂诗》七首，虽有淡淡旅思及世路不平之叹，而看山看水，着重吟咏景色。1874年，有五律《甲戌新春，自家计偕入都，至八月下旬始回庆远任所，一路往还纪行之作》十四首，神闲气静。五古《数月之久，不得芸择儿竹报，遣急脚人回家探问，人回，知其报书为客所浮沉，且知其滥膺选拔，寄此箴之》一诗，舐犊情深，寄望殷切，绳准嘉言，鞭策有加，质朴自然，读之足可动人。

黎氏后期的七古如《宜州谒黄山谷先生衣冠墓，用先生集中题杜子美浣花醉图诗韵》与五古《徐子远太守斋中观仇十洲所画司马温公独乐园图》，虚实相间，开阖自如，布置严密，表现出以文为诗的特点。而后期的七古又有一些新的尝试，《乙丑闰五月十七日夜访彭师古茂才守训于城西楼，因同玩月，更深始归，用李谪仙宣州谢朓楼诗韵》是骚体。《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雪颇大，晓起，徐石琴以和苏长公聚星堂雪诗韵见示索和，勉和一首》是禁体诗。

同一时期，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更加明显。五律《夜坐杂书》以议论入诗，也较直露，七古以议论入诗则比比皆是，如《大寒节与及门诸子游凿字岭，用李义山韩碑诗韵作诗，示诸同行》即是一例。《游金桓山歌，次韩昌黎石鼓歌》以及其他歌行体，时发议论，经营布置，讲求雅洁而谨严，俨然将桐城文法引入诗歌。《清明后一日与农雨苍重谒刘太仆墓，补读陈寿山先生所撰神道碑，次农雨苍诗韵》一诗，可见其心折桐城派的程度。《王烈妇行》十解，每一解可以看作散文的一段，而且语言也散文化了。

黎氏作诗，也有败笔。他⁷好雕琢，但个别地方，语言却粗